



勤政的嘉庆皇帝

赵基◎主编

盛世君王

(下)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顺义

封面设计:席慧娟

名家藏书·盛世君王
勤政的嘉庆皇帝(下)

编 著 者 赵基
出 版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 010010
发 行 新华书店
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字 数 5000 千
版 次 2004 年 9 月修订第 2 版
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印 张 450
标准书号 ISBN 7-80595-660-X/I·262
总 定 价 960.00 元
本册定价 12.50 元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前言

在世纪更替，风云变幻之际，中国封建王朝走向了灭亡，与之相伴随的皇帝也成为了历史。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，实际上也就是皇帝的历史；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，皇帝曾经煊赫两千余年。上起始创“皇帝”名号的秦始皇，下迄末代皇帝溥仪。社会是进步的，皇帝终于被历史的烟云所湮埋。

本套丛书从不同的侧面对历朝历代皇帝及皇后进行了描述，有胸怀壮志的开国之君；有治国有方的盛世之君；还有居于乱世，有心治国而回天乏力的乱世之君，最后却在一帮伶臣的包围下沦为一个昏君；更有命运悲惨，身首异处的末代君王。苏轼曾做过一首词，其中有两句“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，后世常拿“高处不胜寒”来形容皇帝的处境，既贴切，又含蓄。这是深通人情、对居高位者的匠心写照，又是身入孤绝之境的无奈何的喟叹，

凡为了追猎高位有做皇帝心愿的人在愿望目的达到之后，都免不了“高处不胜寒”的境地，如果以伎刻的心理处理与他人的关系，则所得到者恐非一个“寒”字了得，所谓不诚无物，则皇帝的遭遇犹如水中之花、镜中之月而已。幸与不幸，可质诸心而不可质诸纷繁之表面。

本书遵于历史，而又用艺术的手法，集知识与趣味于一体。内容充实，改变了以往历史题材书籍的生硬。适于广大中小学生阅读。

编者

目 录

- 第七章 风雨飘摇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八章 天理教徒闯京城 …… (45)
- 第九章 猝死之谜…………… (117)
- 第十章 宫廷生活与作风…………… (144)



第七章 风雨飘摇



嘉庆元年(1796年)正月初七日,湖北宜都(今枝城市)、枝江(今枝城)、长乐(今五峰)等地红阳教首领张正谟、聂杰人等率众起义,从此揭开了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的序幕。各地教徒纷纷响应,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。他们占据山寨,攻拔县城,惩办贪官。

三月,姚之富、王聪儿、张汉朝、高均德等率众集中于襄阳地区。为了表达对已故襄阳地区红阳教首领齐林的怀念和敬重,姚之富等人推举齐林的妻子王聪儿为总教师。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,起义烽火迅速燃遍襄阳、郧阳(治今郧县)、宜昌、施南(今恩



施)、荆州、汉阳、荆门等湖北大部分地区。起义蔓延到陕西、四川、河南等省,当地的红阳教首领徐天德、王登廷、冉天元、王廷诏、苟文明等纷纷率众响应。各路起义军多则数万人,少则数千人,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。

为了镇压起义,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、陕甘总督宜绵、四川总督福宁、湖北巡抚惠龄、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,不久又命都统永保总统军务。但是,在最初的半年中,清军的围剿并不顺利,“官兵先后杀贼不下数万,而贼起益炽”。起义军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,势力旺盛。而各地的地主阶级则全力站在官府一边,组织团练乡勇,协助清军镇压起义军。因此,这场以红阳教名义发动的反清斗争,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大搏斗,是一次真正的农民大起义。

起义一开始,各路起义军因受红阳教内派系繁多、互不统属的影响,大都分散作战,彼此不相联络。他们或固守孤城,或盘踞山寨,消极防御,为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,以致聂杰人、张正谟、曾士兴、陈德本等部很快即为清军消灭。而襄阳起义军则与其他各路起义军有所不同。

王聪儿、姚之富在起义之初就主动出击。四月初,他们率部猛攻襄阳城,“顷刻间,该府长门、南门、东门蜂屯蚁集,不计其数”,冒着清军密集的炮火和弓箭的射击,“抢取门板遮面直前,用木梯、木板攀城”。但由于襄阳城高墙厚,清军顽强抵抗,起义军久攻不克。

五月下旬,王聪儿、姚之富从襄阳撤围,挥军南下,进攻湖北重

勤政的嘉庆皇帝

镇钟祥。当时，清守军力量薄弱，而起义军在贫苦农民的支援下，日聚日多，斗志极为旺盛，六月初终于攻克钟祥。起义军的胜利，引起清廷的极度恐慌。在嘉庆帝的再三督令下，永保亲自坐镇指挥，调度各路清军，实行南北夹击，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。

为了冲破清军的包围圈，王聪儿、姚之富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即以一支部队佯攻清军粮台，转移永保的注意力，然后率领主力越过山岭，冲破清军拦截，回到襄阳的双沟、王家楼一带。清军尾追不舍，在陈家河（襄阳北）一带遭起义军伏击。双方短兵相搏，清军大败，急忙撤退。嘉庆帝闻讯，大骂永保无能，下令将其逮入京师治罪，而以惠龄总统军务。

这时，姚之富认识到，在敌强己弱的形势下，再与敌人打阵地战无异于飞蛾扑火，遂决定采用流动战术，与清军周旋。他再三告诫部属：“断莫与官兵接仗，遇见时即四散奔走，总要官兵不知我们出没才好，……俟官兵赶逐疲乏之时，再拼死上前抗拒，若敌不住，再逃不迟。”这种“敌进我退，敌疲我打”的战术，保存了襄阳起义军的主力。

嘉庆二年正月，王聪儿、姚之富为了避开清军的围追堵截，决定实行战略转移，向河南挺进。一路上，起义军“不整队，不迎战，不走平原。惟数百为群，忽分忽合，忽南忽北”，使清军疲于奔命，而又找不到起义军主力。起义军却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清军。王聪儿亲自带领的一支由女教徒组成的起义部队，个个英姿飒爽，战斗力颇强。她本人又能身先士卒，勇敢善战，在马上运用双刀，矫

捷如飞，所向无敌，不少清军将士见了惟恐躲避不及。

三月，起义军抵达陕西镇安。为摆脱清军的尾随追剿，王聪儿、姚之富又决定向四川进军，以便与当地起义军会合。他们沿汉水北岸经洵阳（今旬阳）、安康，直抵紫阳。五月十二日，由紫阳白马石、汉王城等处渡过汉水。5天之后，清军统帅惠龄才率大队兵马赶到，结果贻误了战机。

嘉庆帝闻讯大怒，斥惠龄竟“放贼全数渡江”，“无耻之至”，并说：“兵法有半渡而击者。贼匪于十二日偷渡时，若急蹙贼踪，邀之半渡，可以聚而歼戮。乃坐失机会，实属大错。”他下令革去惠龄的“总统之任”，而以陕甘总督宜绵代之。

王聪儿、姚之富率领的襄阳起义军顺利地渡过汉水后，即分三路向四川挺进。六月初，又合兵一路，穿越大巴山区，经通江、达州（今达州市）于二十二日进入东乡（今四川宣汉），与四川起义军徐天德、王三槐部会师。

徐天德、王三槐等人在四川起义后，就把山寨设在悬崖峭壁、深林密管之间，消极防守，结果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，使清军赢得了集结力量、移师入川的时机。在宜绵的亲自督令下，明亮、德楞泰、惠龄等人分率所部清军从北、东、南三个方向向起义军猛扑过来。徐天德、王三槐等率众与清军苦战，屡遭失败，大量减员，情况十分危急。王聪儿、姚之富等人率领襄阳起义军入川，扭转了四川起义军的不利处境，推动了四川反清斗争形势的发展，为其后来成为这场大起义的主要战场奠定了基础。

川楚起义军会师后，“分屯山冈，延亘三十余里”，起义声势更为壮大。经共同协商，决定按地区分别编为黄、蓝、青、白等号，设掌柜、元帅、先锋、总兵等职。其中，湖北起义军方面，王聪儿、姚之富等称襄阳黄号，高均德等称襄阳白号，张汉朝等称襄阳蓝号；四川起义军方面，徐天德等称达州青号，王三槐等称东乡白号，龙绍周等称太平（今万源）黄号，罗其清、苟文明等称巴州（今巴中）白号，冉文俦、冉天元等称通江蓝号。

东乡会师壮大了起义声势，但也暴露出农民小生产分散、保守、落后的弱点。各路起义军不仅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部，没有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，而且彼此猜疑，互相防范，不能团结对敌。会师不久，即以“大家分散便于逃走”为由，川楚起义军各自为战，互不联系。这就使瞬间出现的大好形势化为乌有。

东乡会师以后，王聪儿、姚之富鉴于四川起义军中部分人的不合作态度，认为难以在四川立足，加之一味迁就部下“四川地方生疏，不愿前往，立意总欲渡江回乡”的安土重迁思想，作出了分两个梯队重返湖北的决策。前队由王聪儿、姚之富率领，直趋襄阳，后队由王廷诏等率领，牵制清军主力，保证前队顺利到达目的地。一路上，前有清军明亮部堵截，后有惠龄及恒瑞、庆成等部紧追。但起义军发挥勇敢善战的精神，冲破白帝城清军防线，进入湖北巴东、归州（今秭归）地区，然后趋南漳，欲从南漳回襄阳。由于前有清军重兵堵截，回襄阳之路已被断绝，王聪儿、姚之富又率部西走房县、竹山，旋经竹溪再度进入陕西，并在入陕途中大败清军明亮



部，烧护军统领惠伦。嘉庆帝得知起义军又回陕西的消息后，将宜绵革职，改由湖广总督勒保总统军务。

十月，王聪儿、姚之富为了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，决定强渡汉江，伺机奔袭西安。为此，将襄阳各号起义军重新组成四支部队，分别由王聪儿和姚之富、王廷诏和高均德、李全和樊人杰、张汉朝率领。十二月初，王、姚率部向汉中东挺进，以吸引清军主力，而高均德则乘清军不备，趋汉中西，出其不意地强渡汉江，兵锋直指西安。明亮、德楞泰唯恐西安有失，撤下王、姚部，追剿高均德部。这就使王、姚等各部起义军得以顺利渡过汉江，并与高均德部胜利会师。

襄阳起义军渡过汉江以后，王、姚、高部于嘉庆三年二月在镇安、山阳、商州一带，与清军主力明亮、德楞泰、额勒登保部作战，而李全、王廷诏所部则由城固北趋宝鸡，直逼郿县（今眉县）、盩厔（今周至）。随后，李全部的前锋王士奇部经盩厔进至西安城下，迫使陕西巡抚秦承恩龟缩城内，“日久哭泣，目皆肿”。然而，王士奇部战斗力毕竟有限，且孤军深入，弹药粮草无从接济，以致与清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失利，随即败退。王、姚部在额勒登保所率清军的围攻下，也立脚不住，不得不向湖北方向且战且走，于三月初退到湖北郧西与陕西交界处的三岔河时，被清军和当地地主武装团团围住。王、姚指挥起义军占据山梁，居高临下与清军战斗，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。终因弹尽援绝，突围未成，全军覆没，王聪儿、姚之富先后跳下悬崖，壮烈牺牲。王聪儿、姚之富牺牲后，襄阳起义军中

勤政的嘉庆皇帝

的王廷诏、李全、高均德等部，在陕西南部及陕西、湖北两省交界处与清军进行过多次战斗，因失利而进入川东北地区，继续坚持反清起义。至此，湖北各地的起义均已先后被镇压下去，只有张汉朝部还在湖北西部活动。此后，四川成了起义的主要战场，四川起义军成为这次起义的主力军。

二

四川起义军中队伍繁多，一般来说分为两大支：一支由达州青号徐天德和东乡白号王三槐、冷天禄领导，另一支由通江蓝号冉文俦和巴州白号罗其清领导。

嘉庆三年正月，两支四川起义军由梁山（今梁平）、垫江、渠县四出活动，不久“又复合并一处，以致达州、开县等处道路梗阻，军火、粮饷未能接济”，引起了清廷的惊恐。为了改变清军在四川的被动局面，嘉庆帝令勒保任四川总督，统一筹划四川军务。

早在嘉庆二年十二月，勒保就认识到，四川清军少而起义军多，“以致有贼之地无兵，有兵之地无贼，并有贼过而兵犹未来，有兵到而贼已先去者”。为此，他提出应通盘筹划，“先从川东进剿，清一路，再进一路”。通过观察，他选定王三槐为突破口。东乡白号起义军首领王三槐，是一个斗争意志极不坚定的人。自参加起

王 君 世 盛

义后，他就幻想通过清廷招抚，谋个一官半职。嘉庆三年七月，勒保派人诱劝王三槐去其军营“谈判”，将其逮捕，解京处决。

王三槐死后，东乡白号由冷天禄统率，继续高举反清大旗。十月，勒保以大军围攻东乡白号义军据点安乐坪寨。鉴于寨中盐粮将尽。冷天禄行缓兵之计，诈称请降，麻痹勒保，然后于夜间率军冲出包围圈。但由于损失很大，东乡白号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。

接着，勒保又把罗其清部当作围剿的主攻目标。当年六月，罗其清和冉文俦两支起义军占据川北大神山，与陕西起义军连营数十里，一时势力大盛。不久，德楞泰、惠龄等遣兵扼住山后的渠河，防止起义军向北撤退，而以主力围攻大神山。经过激烈战斗，清军连破起义军几个营寨，杀死 2000 人。但由于起义军顽强抵抗，清军始终未能攻占大神山。七月，清军又分三路猛攻大神山，起义军被迫撤至营山县的箕山。德楞泰和惠龄率军前后夹击，起义军又损失 4000 余人。八月，德楞泰见起义军坚守营寨不出，便派少数清军前往叫骂，而于中途埋伏重兵邀击。罗其清中计，亲自引兵下山迎战，结果大败。这时，高均德、龙绍周等湖北起义军北走广元，与徐天德、樊人杰、王登廷等部起义军合兵直趋陕西，德楞泰急忙舍弃罗其清、冉文俦部起义军，分兵数路截剿高均德、徐天德部。经过四昼夜的战斗，高、徐起义军损失四五百人，已无路可退，被迫来到箕山。而罗其清部起义军乘清军北追之际，分兵五六千人猛攻营山县城。徐天德也扼住渠县饷道，与罗部形成犄角之势。不久，清军主力到达，罗、徐等部被迫退回箕山。德楞泰遣乡勇严防

勤政的嘉庆皇帝

各隘口，并约诸路清军会剿。九月，罗其清等被迫放弃箕山，与李全、王廷诏等部退据营山附近的大鹏山。

大鹏山广百余里，四周多悬崖峭壁，地形极为险峻。山上有泉水，并有旧建城寨，石墙甚坚固。起义军刚至大鹏山，即遭到额勒登保、德楞泰、惠龄、恒瑞四路清军的围攻。起义军将士毫无畏惧，一面屯聚粮食，分立卡隘，严密防守，一面派兵分劫巴州、渠县运道。由于徐天德、冉文俦率兵攻打大竹、梁山二县，分散了清军的部分兵力。十月，清军架梯猛攻大鹏寨，又四处放火焚烧，使整个山寨成为一片火海。罗其清立脚不住，率部分起义军出走。十一月，额勒登保亲自督军攻寨，用炮轰击，终于攻破大鹏寨。随后，罗其清和逃散的起义军战士均被清军和乡勇搜获。十二月底，冉文俦部在通江被德楞泰、惠龄部击败，冉文俦于突围时牺牲。

嘉庆四年(1799年)正月，太上皇乾隆帝去世，嘉庆帝亲政，真正掌握了朝廷大权。

此时，起义军虽因罗其清、冉文俦部的覆没，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挫折，但起义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张汉朝部在陕豫交界至陕甘交界的南山地区，坚持抗清斗争；高均德、李全、樊人杰、徐天德等部，在川楚陕交界地区时而独立作战，时而联合行动，使清军顾此失彼，疲于奔命，清军统帅勒保陷入一筹莫展的窘境。乾隆帝自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爆发即“寝膳靡宁”，至咽气时犹拉着嘉庆帝之手，“频望西南，似有遗憾”。

在嘉庆帝亲政之前，一切“剿捕”事宜均由乾隆帝及其宠臣和

珣主持。而各统兵将领“皆以和珣为可恃，只图迎合钻营，并不以军事为重，虚报功级，坐冒空粮，其弊不一而足”。清军将领平时惟酒肉笙歌自娱，一遇战事则“拥兵自卫，不敢近贼，或命将弁堵剿，将弁亦不向前，惟催督乡勇，乡勇亦不踊跃”。当时川楚各地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：“贼至兵无影，兵来贼没踪，可怜兵与贼，何日得相逢？”“贼来不见官兵面，贼去官兵才出现。”这是对清军腐败无能最辛辣的讽刺。

显然，川楚陕起义形势和战局的发展变化，迫使嘉庆帝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相应的措施，重新部署力量。其主要措施有：

第一，惩办权臣。嘉庆帝在乾隆帝大丧之际，果断地处决了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和珣，使政治、军事大权操于己手。第二，统一事权。嘉庆帝认为，以往镇压起义之事所以收效不大，还在于“事权不一”，为此“特申明军纪”，授勒保为经略大臣，“赐以印信”，统一指挥川、陕、楚、豫、甘五省军队，所有各路带兵大臣、各省督抚均听其节制。同时，对作战屡次失利的将领责以“纵贼”之罪，其中督抚、将军如湖北永保、惠龄，河南景安，陕西宜绵、秦承恩，四川英善等人或被处死，或革职充军。第三，增调兵力，除了集中五省兵力之外，又先后抽调京营满兵、蒙古兵、陕甘回兵、苗疆兵、广东兵，以及不计其数的军资、器械。第四，竭力分化瓦解起义军。嘉庆帝亲自撰写了《邪教说》一文，公开申明：凡习教而又奉公守法者不予查拿，聚众犯法者必严加惩办。尤为毒辣的是，嘉庆帝三令五申，要在各起义地区广置寨堡。

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不仅危及清王朝的统治，而且直接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，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。各地地主、乡绅纷纷组织乡勇、团练，帮助清军守城和镇压起义军。据载，嘉庆二年仅四川一省的乡勇即达 30 余万人。同年，襄阳一带地主阶级为卡断王聪儿、姚之富起义军的粮饷和武器供应，开始大修堡寨。嘉庆三年，兰州知府龚景瀚提出“坚壁清野”之法。他说：“为今之计，必行坚壁清野之法，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，晓谕居民，团练壮丁，建立堡寨，使百姓自相保聚，并小村入大村，移平处就险处，深沟高垒，积谷练兵，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。贼未至则力农贸易，各安其生；贼既至则闭栅登陴，相与为守。民有所恃而无恐，自不至于逃亡；别选精锐之兵二三千名，以牵制贼势，不与争锋，但尾其后。贼攻则救，贼退则追，使之进不得战，退无所食，不过旬余，非溃则死耳。不战而屈人，策之上者也。”

勒保任经略大臣以后，采纳了龚景瀚的建议，并会同各省督抚晓谕各州县，设立碉堡，坚壁清野，招募乡勇，建立地主武装团练。随之，各地修筑堡寨，垒起三四米的高墙，墙前挖有深沟，把当地民众强行集中到堡寨里，并行保甲之法。乡勇平时清查起义军的“细作”，战时则登上堡寨高墙抵抗起义军的进攻。此法一经实行，几乎割断了起义军同广大人民的联系，使起义军的兵源、粮饷和武器供给均发生严重困难。不过，清廷的修堡寨和坚壁清野政策，其效力毕竟是有限的，起义军也未被困难吓倒，仍以各种手段打击敌人。嘉庆四年八月，嘉庆帝以勒保“安坐达州，虚糜厚饷，又坚决不

必添兵之说，致贼蔓延”，严旨诘责。随后又以围剿徐天德不力，将勒保革职拿问，改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。

当时，各地起义军时分时合，运用游击战术四处打击清军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高均德牺牲，冉天元毅然挑起指挥重任。冉天元英勇善战，他屯兵苍溪，抗击来犯之敌。十一月，额勒登保指挥清军进攻苍溪。他以杨遇春、穆克登布分左右翼进行包抄。左翼穆克登布恃勇先进，绕出起义军前。起义军抓住机会，以大部队冒死冲突穆克登布后帐，使其腹背受敌。双方短兵相搏，清军副将以下24名军官、兵勇200余人被歼。接着，起义军以全力猛攻额勒登保大营，血战竟夜，安全突围。苍溪之战是起义军处于低潮时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，沉重地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。

与此同时，王廷诏等人鉴于难以攻破敌人堡垒，遂率2万名起义军将士由陕西城固、南郑（今汉中市）转移，于略阳抢渡嘉陵江，进入甘肃，与那里的起义军会师。额勒登保急忙移师追剿，与陕西巡抚台布配合，将甘肃起义军逼回陕西境内。经额勒登保、杨遇春、王文雄等部清军合力围剿，这支起义军后来兵败川北南江，王廷诏被俘。

苍溪之战后，冉天元重整旗鼓，于嘉庆五年正月率领万余名起义军将士由定远（今武胜）渡过嘉陵江，向川西挺进。此举吓坏了清统治者，成都、重庆同时戒严。嘉庆帝以四川总督魁伦防范不力，将其革职留任。魁伦本一介书生，不谙军事，他派悍将朱射斗率3000清兵进击，自率主力殿后。当朱射斗在蓬溪被义军包围